

了如指掌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法学讲演录

[英] 约翰·奥斯丁 / 著

John Austin

江西教育出版社

WESTERN CLASSICS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第19(2) 目录

有案可查 (Laurance)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法学讲演录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Lectures on Jurisprudence

1998年1月1日

1998年1月1日

John Austin

【英】约翰·奥斯丁 / 著

江西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法学讲演录 / (英) 奥斯丁 (Austin, J.) 著; 支振锋
译. — 南昌: 江西教育出版社, 2014.1
(了如指掌·西学正典)
ISBN 978-7-5392-7277-1

I. ①法… II. ①奥… ②支… III. ①法学 IV. ①D9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85469号

法学讲演录

FAXUEJIANGYANLU

作者: (英) 约翰·奥斯丁

出品人: 傅伟中
策划: 周建森
组稿编辑: 万哲
责任编辑: 万哲
特约编辑: 杨文建
装帧设计: 了如指掌创意馆

出版: 江西教育出版社
发行: 江西教育出版社
社址: 南昌市抚河北路291号
邮编: 330008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37.5
字数: 554千字
版次: 2014年1月第1版
印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印刷: 北京市通州鑫欣印刷厂
书号: ISBN 978-7-5392-7277-1
定价: 78.80元

赣教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向我社产品制作部调换
电话: 0791-86710427 (江西教育出版社产品制作部)
赣版权登字-02-2013-4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永不落架的书

每个时代都有每个时代杰出的思想，每个时代都会产生一些比大众对真理的形态看得更清楚的人物。他们超越同侪，且有深刻的见解和远大的眼光；他们看到人类问题的全体，免于繁琐、短视的思想。

美国思想家、诗人埃默森说：“从所有文明国度里精挑细选出那些最具智慧、最富机趣的人来陪伴你，然后再以最佳的秩序将这些选择好的伴侣一一排列起来。”这样的人都知道每个时代、每个地方的每个人，都面临一个不变的问题——关乎个人和其同侪、社会，乃至全人类、宇宙之间基本关系的性质的问题。对这种问题的看法，可以决定他会怎么做，甚至可以决定他成为怎样的人。

对于这类问题，人类把所能想出来的最好的答案流传下去，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塔西佗，到马克斯·韦伯、熊彼特，以资下一代和更下一代的人去考验、去辩论，而这些最好的答案又汇聚成一部部传世之作。法国思想家笛卡尔说：“读杰出的书籍，有如和过去最杰出的人物促膝交谈。”这些人类最深邃的思想，最高超成就的文字记录，能把我们在过去、现在、未来所面临的问题，能把人类所做过的、即将面对的以及将来可能发生的事情，做出最正确而永久的记录。

例如，经济学的主要创立者亚当·斯密不但写出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还在更早之前完成了《道德情操论》。该书从人类的情感和同情心

出发，讨论善恶、美丑、正义、责任等概念，进而揭示人类社会赖以维系、和谐发展的秘密，是市场经济良性运行不可或缺的“圣经”，堪称西方世界的《论语》。

法国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卢梭的《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是一部充满智慧的书，每行都渗透着卢梭的苦苦求索，从各个角度清晰地阐释为什么人类的进步史就是人类的堕落史。卢梭认为，私有制的确立是造成人类不平等及其严重后果的根源。这篇论文可谓卢梭整个政治学说的导论。

凯恩斯的宏观经济学、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和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并称为20世纪人类知识界的三大革命。《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是为应对20世纪30年代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大萧条而作，它的核心主题是如何解决就业，以缓解市场供求力量失衡的问题。正是在这本书中，凯恩斯提出了国家调控思想，成为现代宏观经济学的扛鼎之作。该书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治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经济学家把该书的出版，称为经济学理论的“凯恩斯”革命，并认为它与亚当·斯密的《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理》及马克思的《资本论》同为经济学说史上非常伟大的著作。

那些对人类追寻真理有永久贡献的书，我们称之为“经典”。新东方联合创始人王强更深情款款地指出：“‘经典’是那些永远占据着你的书架，又永远不会被你翻读完的书。”也就是永不落架的书。凡是能对重大的事情，给多数人的思想以久远而深刻影响的书，便是了不起的书。这样的书可以充实任何年纪的人，使之能以别的时代、别的人们为背景，从而能真正深刻地透视今日。

——编者

前言^[1]

在将先夫那些具有如此之品质与价值的著作向公众推出之前，我想，也许有必要去尽力为我所已经做出的努力说上几句。我也必须解释为什么我决定要出版那些先夫遗留的尚未完成的作品。的确，后面的这个决定是前者的必然结果，因为我绝不能犯下像试图修整和改变他作品这样傲慢不敬的罪过。

我谦恭地提供这些解释给那少数几个适合提及我先夫的人，并且恳请他们不要认为我如此忽视先夫的声望而轻率鲁莽地做出这些可能损害先夫在他们中已建立起的名誉（几乎不顾他自己）的事情来。面对他们的评判与坦诚，我推荐这些尚未完成的遗作。无论他们能发现什么缺点，请让他们确信他本可以发现得更多，发现得更好。

所有对法学科学感兴趣的人都知道，本书乃是再版的那个版本已经绝版多年了。从这一事实为世人所知的时候起，先夫收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热情殷切的恳求，希望他能出版其第二版。这些恳请足以激起除他之外的任何人的虚荣心。

[1] 这篇序文属于1861年版或者重印的《被界定之法学的范围》，在其第25页的部分结束。而接着第25页这部分之后的属于剩余讲座的版本则出版于1863年，构成了1861年版的续篇。

遗憾的是，这些都来得太迟了。公众，或者说公众中少数对法学这门学科感兴趣的人未能在它所达致的范围内找到一条深刻清晰的溪流，直到这些思路和建议之水流入其他轨道，或一起消失殆尽。在如雪片般飞来的出书要求变得日益迫切时，在他写作本书时所处的精神状态与这种出书要求所感到的他的状态之间，又经历了太多的岁月与人事。首先就是他致力于成为一名法学教师的希望、兴致及热情已经在忽视中毁灭；再者，对于先夫这样一个很少持乐观态度的人来说，这些希望、兴致以及热情是不可能再次产生的。

我并没有打算去啰唆地细述一个除了失望和苦难外再无可述之事，并且在选择和需求上都始终在灰暗中度过的人生。没有什么比将他的私生活呈现于公众的监督之下更有悖于先夫谦恭矜持的品性了，而且追求那种与先夫格格不入的世俗社会的赞美（即使我能够确认得到了它）也无法与我对先夫的敬仰之心相一致。

但是，由于受到我所遭受的一些条件的影响，以及考虑到先夫那些最有建议资格的朋友所给的忠告，最终，我决定再版如下这卷，并且出版那些在这里已经构成一部分的系列讲座的剩余部分。我似乎有必要解释一下先夫未完成这些讲稿的情况，告诉大家为什么作者对这一作品冥思苦想却最终不能完成；为什么已出版的那部分内容会如此长时间地顽固地与公众隔绝；以及，最终是什么使我决定承担起准备这些出版材料的艰辛任务。为了做这项工作，我有必要叙述一下与先夫的研究进程直接相关的其人生的那些片段；并且，即使怀着巨大的痛苦，我也必须简要涉及那些使先夫促进法学进步与传播重要真理的努力最终以无奈收场的一些特点和重大事件。

如果我再更深入地研究一下先夫的个人性格，以致超过了对我的目的来说那被认为是绝对必要的限度，就会发现我的道歉与辩解已经出现在下面这些话之中，它们出自于一位理解并且欣赏先夫的作者：

“他个人的性格特点比他的智慧更有益于，或者说本应该更有益于当今时代。他生于贫穷且死于贫穷。他很少为人所知，也很少为人所赞美，而且他也从不寻求社会给予回报，但是他一生的言行却体现出一种高贵和宽宏的品质，这种品质所传达的最为深刻的主题之一就在于它可以被认为是伟大的

真正本质与源泉。”

奥斯丁先生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参了军，并服役五年，要不是在他的性格和情感中所留下的永久印记，这一事实现在看来并不重要。虽然他最后所从事的是一个看起来更加符合他天分的职业，但终其一生他都保持着对军人品质的强烈共鸣和尊重，因为他同样具有这种品质。高度的一丝不苟的荣誉感，对弱者侠士般的温情，具有宽宏无私的热情而不失对权威与纪律的尊重以及坦率与忠诚，以上的一切，他认为就是一名真正的军人所具有的独特品性，而这些也正是他本人所具备的；又或许，较之与其智力天赋，这些品性更为卓越的成就了他的非凡。

奥斯丁先生于1818年获准正式成为一名律师。如果那时他人的评述和预言能在能力和前途方面给予这个敏感而苛刻的人以信心的话，奥斯丁先生本会带着毫不犹豫和兴奋的精神投入他的律师生涯中，因为在他学习的几间律师事务所中的每一位杰出的律师都认为他的能力和运用是无与伦比的，并且非常有信心地预测说他在其律师职业中能够取得最高荣誉。

但是他从来都不是一个满怀希望的人。即使在那些希望最迫近现实的日子里，他也从不对未来持乐观态度；（请允许我在这里加入这句话）他也从来不曾试图对那个他邀请与他一起共建未来的人鼓吹美好光明的预期。带着令人倾心的真诚，从一开始，他就使她成为他一直心仪的那种红颜知己。在他结婚前的四年，他在一封信中做出了如下总结：“……也许是上帝吧，首先是他，赐予我们力量使我们在贫困与失望面前不气馁，而可能与其抗争到底。”由此，正如她所拥有的极少的权利那样，这番告白的接受者便不再抱怨这一清楚地摆在她面前的命运，并主动接受。她也从未曾想象过会有一个人如此符合她的期盼，如此满足她的骄傲，与此同时，这也致使她成为奥斯丁那可敬的贫困生活的风雨同舟之人。

在这里必须允许我说的是，我们不能认为先夫有过失望的期盼，而我必须阐述的这些事实的影响力也不会被那种认为这些都是个人失望的发泄方式的观念所削弱。即使在这简短的叙述中会有一些抱怨，这些也都是因为我回想到先夫那未被欣赏的优秀品质，未找到用武之地的强大能力，以及那些因

被漠视和忽视而令人寒心的对人类利益的崇高热忱。这些又都源于我回想到先夫那过分审慎和过分敏感的精神所经历的挣扎和痛苦，以及他为了使人们接受一种他深信对人类非常重要的科学主张而孤独无助地做出的徒劳努力。这种无可估量的个人损失所带来的悲痛是如此巨大，而这种损失又为世界所承受的损失的遗憾所扩大了。

很快每一个带着最殷切的期望关注着奥斯丁的人都明显地感到他不会在律师业取得成功了。他的健康变得糟糕；他常遭受疯狂的打击，并置他于一种极端衰弱和心力交瘁的状态。而且，由于这些打击都是由身体或精神上的因素引起的，所以对他来说没有比法庭上紧张的实践、沉闷的气氛和持续的激动等更糟糕的了。

而且一旦在身体上无法适应他所选择的职业，在其精神本质上奥斯丁就更不具备做律师的资格了。在高度的紧张和敏感中，他全然不能够胸有成竹、大胆坦然、安然自得以及自我满足，尽管他也意识到了某种优越感，但这种优越于他而言压迫胜于激励。奥斯丁感觉到他所具备的才智和手段，虽然有着可能的最高韧度，但却不适用于他所从事的这一行业的竞争，而且他渐渐变得越来越自我苛求和缺乏自信。他无法迅速完美地做好任何事情；他无法说服自己去忽略工作中的任何环节；他对不同时机所倾注的思考和关注也与其性质及重要性不成比例。他的这些习性对于其事业的成功有着毁灭性的影响。

实际上，甚至在他被授予出庭律师资格之前，他就已经察觉到自身在精神上存在着一个细微的特殊部分，就是这一部分使他不具备相应的能力去处理纷繁复杂的人际事务。在一封于1817年他仍在公证立案人法律工作室工作时致其未婚妻的信中，他写道：“我几乎认识到这种迟缓的工作习惯很快就会给我一种对清晰度和精确度的极端而狭隘的体验（我的意思是，在涉及我自己工作的范围内），以至于我将很难鼓起勇气全心全意地发出一封信，即使是对你，除非这封信的准确性和慎重度被精心地确认过，这些可都是开具财产让与证书的必要条件。”

但是，“迟缓的工作习惯”并不会创造，虽然它可以促进。这种倾向，

使他从自己身上强求一定程度上的与敏捷和迅速相矛盾的完美。正如奥斯丁所说，他不能容忍任何瑕疵，而且只要他能发现措辞上有最小的错误或含糊，他就会彻底改动它，直到他精确的头脑不能再提出任何一个缺陷和难点。这种脾性不适合紧急的工作要求。经过一番让他的身心严重受损的徒然挣扎，奥斯丁于1825年放弃了律师事务工作。

1826年伦敦大学（现在的大学学院）成立了。从这一机构的性质和目的上，它呈现出这样一种希望，即为传统大学所排斥的各阶层的人和各种科学分支都可以进入这所大学并得到培养。在这些科学中，法学被提议进行讲授，并选择奥斯丁先生来教授。他一经委任便断然决定前往德国，师从那些他早已深为钦佩的德国法学家，实地学习那些已经完成和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他立即着手学习语言，并在离开英国之前取得了一些进展。1827年秋天，在海德堡游历之后，他携自己的妻儿定居波恩，当时这也是尼布尔（Niebuhr，1776—1831年，德国法学家，大约在1816年或1817年发现了《法学阶梯》一书的原本）、布兰迪斯、施莱格尔（Schlegel，1772—1827年，19世纪德国浪漫主义文学家）、阿尔恩特、威尔克尔、迈科迪、海弗特尔等杰出人士的居住地，从这个社交圈中，他得到了同等的愉悦和指导。奥斯丁先生得到了一位青年法学家的帮助，这个人刚刚登上他的职业讲坛，这种讲坛，男人们无须任何任命就可以获准执教。他们被称为Privatdocenten，（大概指的是日耳曼语国家中报酬直接来自学生学费的一些无薪大学教师。）是助教的一种。通过和这位先生一起研读德国法律书籍，在寻求自己主要研究方向的同时，奥斯丁先生迅速取得了语言方面的准确和完善，并把这种准确与完善运用到了他所研究的每一个方面。正如我从一些细微的备忘录中发现的那样，他也费尽心力使自己洞悉德国大学教学的纪律和模式。

他还经常表现出强烈的愿望要把那些最值得从德国借鉴的东西带回故乡应用于英国。他于1828年春离开波恩，那时他已熟练地掌握了德语以及那里一些最伟大的研究成果。他总是怀念在那里的生活，视之为自己一生中最愉悦的时光。他和同他一样那时定居在波恩的优秀的英国人所具有的诚实庄重的品质为上流社会普遍认可，并在那里建立了一系列最符合他们品味的标准：尊重知识，热爱艺术，思想自由及生活简朴。除了他开始着手新职责所

具有的那些希望、计划以及成就外，对于要放弃一段如此充满兴致和自由的生活也并非没有太多的遗憾和不安，更何况他要忍受伦敦强加给贫民的限制和贫困，以及对那个艰辛且从未尝试过的职业的渴望呢。

然而，除了他一贯的健康问题，一切都很顺利。在离开律师业之前他的健康就受到了焦虑的严重损害，只是因为伦敦大学的任命给他带来的相对平静的心情，以及在莱茵河畔那有益愉快的生活，才使其部分恢复。

他的演讲稿发布在他所教授的一个班上，这个班超出了他的预期。这个班里包括了几个现在在法律、政治、哲学领域最杰出的人物。他对这个优秀的青年团体印象深刻且兴奋不已，并对自己的工作职责产生了一种敬畏。关于人类福利的法律和道德的基础，他尽可能地强调清晰的概念的重要性；他认为自己作为中介将把这些观念传达到更多人的头脑中，并注定会对英国产生强大的影响。这个想法使他充满激情和狂热。从他易受影响的性格和脆弱的天性可以预料，这些情绪并非没有夹杂着对他的身体健康来说过于强烈的焦虑。

在伦敦大学所发布的第一次讲稿的空白页中我发现了一些笔记，这些笔记如此强烈地浸透着他对工作真挚而热情的奉献，以至于我毫不犹豫地按照它们本来的样子抄附如下。甚至那些残缺的文句也是其所特有的，对于那些认识他的人来说更是一份无法言喻的感动。面对这些笔记，他们将活灵活现再次回想起这个人，即使是在这些仓促写下的文字中他对真理与知识的热爱也是显而易见的。

道别之前，我想要说几句话。

它是我在每一次讲座结束时保持交谈的目的。

[对我自己和我班上诸位先生的好处——即席演讲的优势。

就我的那些想法而言，书面演讲稿是不完整的。书写劳动的浪费；即席演讲可以立刻使得听众接受。

书写讲稿的迟钝性。]

所以我希望，首先，养成即席演讲的习惯。对于这一点，我目前还不能胜任，但是借助解说等方法，我希望我可以获得必要的演讲技巧和沉着心

态。这些讨论将带来的另一个优势：计划和执行中的错误将被指出和改正。

我恳请你不要被微小的错误所限制，坦率才是至高的称赞。

我绝不会自己勉强同意……

而且这完全符合对天才的赞赏——因此，对一个人来说难以置信……

我因此恳求你，作为对我的最大帮助，带着异议纠缠我并要求解释——对我的讲座彻底审查。否则，我就不应该站在这里。

能够承担来自友人的批评而不退缩。

从这个冲突上看，即席演讲对双方的优势比任何照本宣科更有益处。

要求他们问与学习相关的问题。

总之，我的要求是，要带着问题与我讨论，并有规律地专心学习。

我发现在他的原稿中有很多章节都标有v.v.的记号，很明显他是要在这些地方进行即席的扩展和分析。

他现在似乎已经得到了一个与其他职业相比最适合他的工作。他独有的品味和才能使他适合从事教师这一行业。他的梳条理和分析说明的能力是无与伦比的，并且他具有天生的卓越口才（当他允许自己发挥这一才能时），这非常有助于集中注意力并在记忆的基础上进行巩固。他即席谈话的口才远比他照本宣科更引人注目。在将任何事情浓缩到书面上时，他那要求每件事都明朗精确的严谨态度和惯常的坚决性格就会引导他删除他认为对结论无益的每一字、每一句。

或许从未有人有更卓越的条件来培训优秀的即席演讲能力，可奥斯丁却很好地结合了他其他的非凡天赋，比如，他那怡然的自信和自满，他的清晰悦耳的声音和完备的辩论技巧。凡是听过他讲话的人无不被他充满活力和创意的演说、丰富广博的知识、学者式的严谨以及语言的异常精确所深深震撼。经典思想和抑扬顿挫的表达方式对他来说是如此的精熟以至于就像是与生俱来的。“我认为”，我曾可怜地试图描述他的演讲，展示给一个朋友，“关于他在谈话中的雄辩能力，很难说你刚才已经说得很充分。但事实是，要描述他的那种令人兴奋而全神贯注的演讲方式是不可能的。他的演讲

使人在一小时之内在如此的高度涉猎了如此广泛的领域！还有就是他非凡的知识和精确的记忆力！”事实上我很少再去努力传达他在日常言谈中的雄辩滔滔的观念。它存在于个别的记忆中。他的记忆力是最不同寻常的，如果不是它一直从属于奥斯丁其他更高的才能，这种天赋将早在惊叹声中被大书特书了。他从未显露他的记忆力，并且因为他的记忆力总是受制于他对真理的严谨追求，致使他的听众确信他不会冒任何风险，而且他的陈述都是绝对可以信赖的。

但是，那些凌驾于其他品质之上的，能够使成功之路更为平坦的品质，却不是他这个性格的人所追求的。他的性格是骄傲的、敏感的，且带着他与生俱来的崇高标准努力做每一件事，只有一种非常独特的鼓励才是他所可能接受的。即使是成千上万的无知之人最为热烈的掌声和赞美也不能带给他些许满足。只有他所尊重的个别几个人的嘉许，或者自己努力的成果趋向于普遍功利的信念才能激励他战胜自己固有的羞涩和保守从而兴奋起来。

他很快就清楚了，自己正处在一个虽然并不显要，但却是安静而安全的职位上，在这个职位上他可以继续为了崇高的科学进步而工作，在那个领域中他知道自己完全是个专家。

我们不必期待这样一门科学——它根本没有被建立，即使在这么一个由于兴趣而非常热心追求科学的国家里——对它的研究与所谓的实际生活并无直接联系，除非在非常罕见的情况下，它很难吸引众多的公众。因此，当人们意识到，那些沉浸于此种之研究当中的少数人应该有一胜任的指引者，那么在那些人也并没有什么希望能够从通常的领域中得到研究和生活资助的情况下，就会有一些基金会提供给他们维持研究。他们的职位虽然不够闪亮，但是也能有保障和令人尊敬，而且可以有时间进行科学研究。然而，在奥斯丁先生所被选任的讲席中这些都没有。并且，由于法理学并不是普通律师职业学习的必要和通常教程，奥斯丁先生的教授职位几乎成了一个空头衔。

“虽然”，《法律杂志》的一位杰出作者在奥斯丁先生的讣告中写道，“作为一名教授，奥斯丁先生的教书生涯有了一个辉煌的开始，但是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个国家并不能连续提供足够数量的学生以满足维持一个教授职位

的需要。而由于除了学生的学费之外学校并不提供教师其他资助，那么除非他有个人财产或者能够从他的教授职位上获得其他的收入，否则其后果就是他将不能够保留自己的讲席。奥斯丁先生并没有什么财产，对于这么一个将研究和展示自己专业视为已经是自己生活全部的人来说，当他发现自己在大多数只知挣钱的法律学生心目中是一个无用之人的时候，他就只有辞职了。”^[1]

这就是他所沉浸之事业的结局，他能怀着全部的热情与单纯的目的来从事这个事业，而很少有其他人能这样。对于他的生活来说这是一次真正的不可挽救的打击——他再也没有从中恢复过来。他的律师生涯的失败对他来说不算什么，对他自己和那些关心他的人来说也从来不是什么遗憾。那个领域不适合他，他也没有做律师的特殊才能，甚至可以说他没有要成为一个能干的成功律师的愿望。但是，作为一个法律哲学的阐释者，没有人能做他所能做的那些工作。

在他写演讲稿的时候，他制作了图表（后文会详述），准备了这一卷要出版的内容。我能断言他没有别的想法、目的或者愿望，他只是想提出他在法律学术方面的研究和发现，并尽可能地广泛传播。这个判断源于他从未动摇过的目标，从未减少的工作，从未对相对贫困的生活和低微的社会地位产生厌恶，从未放弃对于投入自己全部生命的希望所进行的追求。如果说已经在其宽广而又深厚的知识领域中发现了什么从容与谦虚的隐蔽之处的话，那就是我的一个坚定信念，也即，由于他的研究的本质以及他本身的性情，他一定会继续前进，也许会在实际上比较缓慢，偶尔还可能会为疾病所打断，但他必定会终其一生以其从不放弃的坚韧与热情去继续他的研究。

1823年6月，他做了最后一次演讲。同年，他出版了现在的此卷为其重印版的那一卷。他非但并不期待此书能为他带来辉煌的成就，反而惊讶于已故的默里先生在出版此书时的精心准备和宽宏大量。此后多年，他都极其担心，唯恐此书会使那位先生蒙受损失。在一次漫长的我对默里先生进行的访

[1] 1860年5月期《法律与评论》。

问中，他认真回答了我的询问，并向我展示了最后确定的版本，以证明我们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奥斯丁先生的表达完美无缺，令人满意，即使对这个非常正常的成就来说也是如此，这点也是令人惊讶的。他完全意识到了在他出版此书的时候这个领域的研究并不流行。

他说，“真正能把他们的注意力置于科学之上的研究者是如此之少，让人民大众领会到研究者辛劳的价值又是如此之难，以至于科学的自身发展相比较起来缓慢了，而与此同时，一些会使他们得到丰富的最明白浅显的真理，或者是被许多人视为一些毫无价值的或有害的自相矛盾而被予以摒弃，或者是通过漫长而又充满疑虑的斗争而最终艰难地赢得普遍的赞同。”

必须承认的是，最初公众给予他著作的认可并不是很令人乐观的。在那些表示要在一些严肃主题上引导公众舆论的评论杂志中，没有任何一家对本书表示过哪怕是少许的一些关注。一些赞扬的文章也刊登在一些不太流行的杂志上，这些从整体上都使得此书自身最终依靠自身的优点得到展现，并在此后的一段时期里慢慢地得到赏识。

1833年，奥斯丁先生受到布鲁厄姆勋爵的委任，后者是大法官和刑法委员会成员。虽然这导致了他从希望自己能够一直献身其中的领域离开，也使他被限制在了一个和那个已经显示了其自身才能的领域相比更狭窄也比较缺乏创造性的范围中进行研究，但是他仍然在此提出了同样具有深远意义和内容广泛的观点。但是他很快察觉到这些观点对他自身和公众的用处都不大。法律并未赋予委员会有权去进行基本的改革，而这些改革他认为是有好处的。在他的观点中一个基础性的问题需要被指出，就是在建立任何令人满意的刑法结构之前，先要有一个刑法的基础，而这是和他的那些同事有着广泛的区别的。对于委员会能够对那些建设性的目的起到作用，他几乎没有信心。他对我说：“如果他们给我每年200镑，然后给我两年时间，我将把自己关在小阁楼里，在两年结束时我将画出一张完整的有关犯罪的图纸，交出一份刑法典草案。然后让他们委任一个委员会把这些法条细化。”每次他从

委员会的会议上回家之后都很沮丧和激动，说他不配收到公众付给他的工资，因为他认为自己的工作使公众能够得到的回报非常少，甚或完全没有好处。从我所发现的一些被涂抹得模糊不清的纸张来看，在他自己有关尊严与职责的崇高感，与那些将私人义务纳入公共义务的更为普通的观念之间，他的心灵正在承受痛苦和挣扎。我也发现了那时他就已开始谋划一部刑法典了。

与此同时，他确信，作为一个法学教师，他是再没有什么指望了。这个国家法律教育的无效在一段时间里引起了这个专业中的那些更为开明的人士的注意。内殿律师会馆已经最终决定，应该做些努力，以使一些人来教授法学的历史和原理。在这个计划的最真诚的推动者中有奥斯丁先生的朋友贝克尔斯泰斯先生，后来还有朗戴尔法官。1834年，奥斯丁先生已经定下来要在内殿律师会馆讲授一门法学课程了。这个职位即便是基于各种各样的条件，他也将会是首选，无论是在名气上或是对他的有利程度上。不幸的是，这个职位仍然不能给予他想要的那种保证和信心。他要做一些建立一个新的事物秩序的工作，这个工作是令人沮丧的，因为它缺少那种通常能使他精神振奋的确定前景，哪怕是遥远的前景也好。他的工作只会被视为一种试验。这种不确定性第一次重压在了他身上。如我所说，他并不具备处理那种偶然的和暂时性的事务的品质。要勇气充盈和活力十足地去工作，他必须事先能够看到，在他面前，可以有一个长期的持续研究，并且能够免受焦虑的烦扰。他不够稳定的健康状况和压抑沮丧的精神，需要得到尽可能的支持。而当他感到对自己的方案或者他自己缺乏信心时，他非常容易情绪低落、伤心绝望，而这就表现在这一个仅仅是暂时性的任命当中。

很明显，导致了他在伦敦大学法学讲席教授之职任命上的失败的原因同样也导致了（或者是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他在出任律师公会职位上的失败。对于任何科学的法律教育的需求，已经开始产生。而一名具有英国律师执照和职位的杰出律师（从才能上说没有人能比奥斯丁先生享有更高的赞美）却走的是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从很大程度上说，能够进入律师职业年轻人对于任何研究都是漠不关心的，除非这些研究使他们的那些前辈们能够

在此获得令人尊重的地位和利益。因此，他那些失败的沮丧，那些高贵的尊严和善良的渴望得不到同情心的支持，或者他作为一个教师的价值不被认可，相互矛盾的职责所带来的内心不安以及对于存在意义的令人疲倦的焦虑，都毫无疑问使得他的健康明显变糟了。他经常会高热不退，而且发作的频率越来越快、越来越猛。他会经常性地完成了对一次演讲非常精心与极端勤勉的准备之后，却在需要进行演讲的那一天不得不给他的班上送去消息说他不能来上课了。不久他就看到了对这些障碍的这种抗争是没有意义的。于是，他断然放弃了这个他只会失败的抗争，安排了一次在欧洲大陆的漫无目的但是安静的修养。在那里他可以安排自己过一种很简单的生活。

从一个取得了世界性成就的国家的角度来看，这个国家认为，世界性的成功不仅仅是回报，更是美德的标准。他带着像他那种人所具有的强烈的挫败感离开了英国，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对真理和人类永恒利益的探索中去了。在这里除非他在某些已经失败的道路上做出了进步，否则他就不会得到除了忽视和一种轻蔑的怀疑之外的任何东西。他清楚地知道这些，并对一个他从未如此自由地谈论过自身的人这么说：“我出生于这样不合时宜的时代和场合。而我也许应该是一个12世纪的学校教师——或者是一个德国教授。”做一个像胡果或者萨维尼那样杰出而令人尊敬的教师对他来说是世界上最值得羡慕的事情。而这个职业在赚钱上的不利地位和在这个国家参加法律实践所获得的收获相比从来就不是容易在他的脑海里留下印记的一个问题。

他在布伦住了一年半，在那里通过一个最值得尊重的忠实的朋友詹姆斯·史蒂芬爵士他得到了一个殖民部的职位，作为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成员去马耳他调查那里岛上居民抱怨的不平等待遇的性质和程度。他接受了这个对他来说尤为适合的职位。公正和仁慈是他天性的一部分，而且在学习和思考中得到培养。他对于居统治地位的人群的傲慢没有任何同情，也不可能对此持放任的态度，不允许侵犯这样的一些条款，它们是英国接收马耳他居民自愿割让土地的根据。另一方面，他的睿智、学识和严格的正义感也不会令他容忍任何荒谬的方案或是毫无根据的抱怨。在他能干而又有经验的同事乔治·康沃尔·刘易斯先生（现在是爵士）的帮助下他提交了岛上的调查，